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司徒慧敏传略	司徒濂 关 辉 (1)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	陈景明 (17)
饮誉乐坛六十年	
——记著名音乐家马思聪.....	马思周 杨 永 (29)
民族音乐家吕文成.....	黄锦培 (56)
风范永存的文艺战士——肖殷.....	吴 倩 (74)
诗人、翻译家梁宗岱.....	伦海滨 (90)
一代艺人阮玲玉	温 华 (104)
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靓少佳.....	何家鸣 (134)
潮剧编剧家谢吟.....	李 平 (139)
老梅素艳	
——记著名潮剧演员洪妙.....	文 舒 维 豪 (156)
我的大半生.....	商承祚 (167)
著名书法家麦华三.....	麦广达 (188)

凝正气于笔端
——记岭东书法家王鼎新..... 蔡英豪（195）

蔡敬翔的绘画生涯..... 李松庵（206）

我从事绘画艺术六十年..... 关曼青（217）

中国画意摄影艺术家——陈复礼
..... 陈 列 金 苓（238）

对《叶挺独立团驻肇庆期间的革命活动》
一文的质疑 陈占标（248）

《广东文史资料》勘误表 （250）

司徒慧敏传略

司徒濂 关 辉

著名的电影艺术家、技术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侨联顾问，原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是我国左翼电影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他原名司徒铭柱，1910年2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坎新楼东闸村（龙湖里）一个爱国华侨家庭。祖父司徒怀祖，少时被卖去美国当劳工，后到加拿大渔船上当伙伙。父亲司徒盛赞，是司徒家第一代知识分子，曾在加拿大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并参加了“兴中会”。年少的司徒慧敏从父辈那里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未入学前，在家乡参与了演剧活动。在赤坎黉国小学读书时，聪明好学，曾自编自演白话剧，人们称他有戏剧天才。1923年，考进广州市广雅中学，在这里，他经常接触进步同学，并参加了共青团领导的“新学生社”，和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嗣后，他转入中山大学工学院附属中学，这是一所职业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参加工作，他选学化学专业。就学期间，他和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到附近一个自来水管厂的夜校教工人识字，讲解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1925年夏，经周文雍等介绍，司徒慧敏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以共产主义

战士身份，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司徒慧敏离开了学校，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让他在广州昌兴街×号二楼，开设一家专卖新文艺书刊的书店——新庐书屋，请了同乡司徒炳炼去做店员兼做监视敌人活动和保卫工作。就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他不畏艰苦危难，仍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1927年，司徒慧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参加了广州起义，从事交通联络工作。紧张关头他与武装工人驻守广州长堤，截击李福林军队过河，英勇奋战，由于敌众我寡，各路起义军被迫撤退。司徒慧敏由司徒管（航空救国会人员）用小艇送至白鹅潭，后来，搭四邑渡（船）回开平。他还在广州读书时，暑假期间，曾回家乡以司徒氏通俗图书馆为基地，积极宣传共产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统一祖国活动，与司徒克夫（南乐）、司徒颖（现在美国）、司徒勃明、司徒巩固、司徒恒（春湖）等共同工作。他此次回乡后继续活动。

到日本留学

广州起义失败后，司徒慧敏开设的新庐书屋被查抽封闭，旧物由司徒濂代为搬回。1928年春，司徒慧敏东渡日本。这时，他的工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又受鲁迅、夏衍等人更事文艺的影响，考入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图案科。同时，参加了由夏衍、沈西苓、许幸之等人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组织。他常到“筑地小剧场”去学习，也参加演出活动，如反映中国“二·七”罢工的《暴力团记》，以及《西线无战事》、《毒瓦斯面具》等进步戏剧的演出，他在学习之余参与舞台设计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电影艺术的发展，参加了日本

大学电影研究班；进早稻田大学电子系当校外生；业余进行无线电研究等。这一切活动，为他以后从事革命电影事业打下了基础。

1929年秋，司徒慧敏因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盟的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关押了两个月，后经上野美术学院教授千头庸也出面交涉，才被释放。1930年春天，他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

研制有声电影

到上海之后，司徒慧敏当过业余工人夜校和中、小学教师，在上海美专代课，还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员。与此同时，他积极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在党领导的夏衍、冯乃超、郑伯奇、陶晶逊、沈西苓、许幸之等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里搞布景设计。1932年初，他进天一影片公司，从事电影工作，任影片布景设计师，是我党的电影小组成员之一。业余，他仍参加左翼“剧联”的舞台装置工作。

这时，司徒慧敏还以极大的兴趣和刻苦钻研精神，学习和研究电影录音技术。自1926年美国有声影片正式问世后，曾引起了全世界、也包括中国电影技术界对有声电影技术的兴趣。司徒慧敏和堂兄司徒逸民（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无线电工程）看到我国拍摄有声影片都采用外国器材，雇用外国录音师进行录音，不仅耗资大，受其制约，而且效果也不好，外国录音师不按拍片进程录音，反而要拍片按录音进程，并时以解约相威胁，司徒慧敏很气愤，就下决心与司徒逸民和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过机械工程的马德建一起，研究有声电影录音的技术。司徒慧敏向他们

学习技术，共同研究，并在自己家里建立录音技术研究室，在设备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研究试制录音机，为了打破美国人对我国电影录音技术的垄断，党的电影小组也热情地支持这项试制工作。1933年秋，他们制作的“三友”录音机尚在试验阶段，田汉、夏衍就多次组织任光、安娥、聂耳、袁牧之等人到他的录音技术研究室来试录。田汉还陪同来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运动的英国进步人士马莱爵士参观他们的试录。马莱看到他们在自己家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高兴地称赞说：“你们不但注意到进步的文艺、进步的电影，你们还注意掌握进步文艺的科学技术武器，这是我到中国之前没有想到的。”这年年底，“三友式”录音机用于电影录音了，尽管比较粗糙，但它毕竟开创了我国电影录音技术工作，使中国电影工业技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趁外国录音师又一次威胁要求解职之时，他们毅然签约解职，司徒慧敏当上录音师，拍影更顺利了。

“三友式”录音机诞生后，司徒慧敏和马德建、司徒逸民集资成立了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还音设备，同时办理各种电机工程的设计，司徒慧敏作为录音师，还先后为明星公司的《姊妹花》、《脂粉市场》、《二对一》等影片录了音。“三友式”录音机制成后，第一次用这台录音机为联华公司的《渔光曲》、《大路》、《新女性》、《浪淘沙》、《到自然去》以及电通公司的《桃李劫》、《风云女儿》、《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录音。与此同时，司徒慧敏看到我国电影科学技术的研究太薄弱，就发起成立了中国电影技术研究会，交流电影技术经验，对加强和推动电影技术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主持“电通”工作

当时电通公司作为三十年代最年轻的电影公司之所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最主要是由于1933年底，国民党当局捣毁了田汉、阳翰笙等人支持的艺华公司后，加紧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迫害。党的电影小组为了继续对反动派开展不懈的斗争，需要开阔新的阵地以壮大左翼电影的力量。他们认为“电通”具备进行制片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这时司徒慧敏作为党的电影小组的一个成员由他去争取马德建、司徒逸民等的合作，将“电通”由器材公司改为制片公司，由夏衍、田汉、钱杏邨等领导电影创作，并联合集中了一批左翼和进步的艺术工作者进入“电通”，形成一支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的创作队伍。司徒慧敏担任了摄影场主任、制片人兼导演。

1935年春，司徒慧敏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自由神》，这是他担任导演的处女作。影片描写一个出身于没落封建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在“五四”运动后，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影响下，受到锻炼和不断成长的故事。影片中，妇女为争取独立自由和为民族民主解放而斗争的主题十分鲜明。影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富有战斗力。司徒慧敏虽是第一次担任导演，但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能较好地将原作的思想内容体现在银幕上，具有真实、朴素的特色，生活气息强烈，特别是表现“六·二三”沙基惨案的一组场面，由于他亲身经历过这场斗争，就使这组戏更富有真实感和激情。在影片中还穿插了不少新闻纪录片的镜头，增加了影片的时代感。这在当时来说，是颇为新颖的。《自由神》反映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鼓

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当时的进步影评说，这部影片把过去的历史“一一地重行述说给我们”，“我们觉得应当继续为争取中国的平等自由而奋斗”。拍完《自由神》以后，电通影片公司一再被国民党当局以停止拍摄、限制影片上映等拙劣手段加以迫害。但“电通”拍摄的《桃李劫》、《自由神》、《都市风光》和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主题歌的《风云儿女》等四部影片，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广大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是这一时期电影战线上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重大胜利。这是党直接领导电影工作的成就，也与司徒慧敏主持“电通”工作的努力分不开的。

积极参加影评

1936年初，电通影片公司在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之下终于停业。司徒慧敏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他除了接受导演职务外，仍担任录音师。在“联华”，他积极组织拍摄反帝反封建题材的影片，导演了《联华交响曲》中的《两毛钱》和《艺海风光》中的《前台与后台》，这两部影片均与蔡楚生联合编剧。

这一时期，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司徒慧敏与左翼影评工作者一起，经常撰写电影评论文章。揭露“软性电影”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在评论影片时，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展开争论。同时，他还善于向一些前辈学习，如孙瑜、蔡楚生、史东山、费穆、沈浮、李萍倩、程步高、朱石麟等，在学习和争论中，他们建立了友谊。团结和争取了电影界的大多数，对保护和发展进步影片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时，自己还年轻，知识经验都不足，无论艺术水平，还是理论水平都还不成熟”。

熟，自己写的影评，从政治上、思想上也许是对的，但是有一些不能说服搞创作制片的朋友，至于从电影专业的技术上、电影艺术的特点、特性上说得不对或不那么贴切，甚至说了外行话的地方也是常有的，这就更应该向那些专家们学习了”。为了写好一篇影评文章，他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刻苦地搜集材料，要求自己在评论电影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形：“当时由于知识不足，只可从为数不多的电影书籍上学习，从好的和中外的电影中学习，为了学习在上海出现的苏联电影，我们千方百计地从日文的电影杂志上找电影的文学剧本，找对白台本。记得有一段时间为了研究苏联影片《生路》和《金山》的电影手法，我所看到的日文资料，可惜只有文学剧本而没有分镜头本，有的电影连故事梗概都没有。我就和放影这些影片的北四川路上海电影院的管理人员和放影师商量好，每天电影散场以后，在放影室的倒片台上、一本本、一段段，有些地方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把画面构图、镜头的编辑次序，甚至把呎数、格数记录下来。北四川路的‘爱普罗’和静安寺路（即现南京西路）的‘夏令配克’电影院是从清晨一直到半夜一场接一场连续放影同一部影片的，观众也是买一次票可以连场看下去，场内既不对号，也可以在放映当中进场和退席。当我发现某一部影片有可学习的地方，只要有时间就上这两家影院去，带着面包从早到晚反复地看、反复记录。这种影院就是我们当时的电影学校。这些艰苦的、也许是笨拙的学习，我看对我们倒是很有好处的。”就是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司徒慧敏变成了电影业的行家里手，旗帜鲜明地参加了反对反动电影思想的斗争。1934年，正当反动派对左翼电影加紧“围剿”，对影片公司加剧白色恐怖的时刻，跳出了几个“软性电影”分子，叫嚷电影是“眼睛吃的冰淇淋”，吹捧那些用

爱情、柔情、含情脉脉以及风花雪月、良辰美景的“形式论”、“美的照观态度论”，“纯粹电影题材论”等来反对一切斗争，非议革命。其目的是反对左翼电影的大众化路线、反帝反封建的题材及革命的思想 and 政治内容。在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下，司徒慧敏和左翼影评工作者一起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揭露“软性电影”的欺骗性和反动性的斗争，孤立了电影界的反动派，团结和争取了电影界的大多数，对进步影片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保卫与推动的作用。

开展抗战电影工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根据党的指示，司徒慧敏和蔡楚生、谭友六等先后到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工作，组织拍摄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游击进行曲》等影片。他们通过与粤语影片工作者的接触和交往，了解到粤语影片在当地和海外拥有大量的观众，就积极筹划抗战粤语影片的拍摄。他们首先争取独立制片公司的合作，又团结一批进步的粤语电影工作者参加工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抗战粤语片《血溅宝山城》的拍摄，并于1938年4月首先在香港上映。这部影片取材于抗战初期中国抗日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的动人事迹，是司徒慧敏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消息报道，激动之下和蔡楚生一面讲故事一面写出剧本来的。是他导演的又一部作品。这部影片倾注了编导者的强烈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中国抗日将士抵御外来侵略者，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气概。《血溅宝山城》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最早宣传抗日战争的一部影片，后来，司徒慧敏在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同志对他拍摄《血溅宝山城》给予了赞许和热情

鼓励，说“你们在香港能把《血溅宝山城》拍出来，而且是抗战以后写抗战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很好的。这样很快写出来的急就章，要求它在艺术上很高很感人比较困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拍这样的片子很有意义”。“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写出反映战争的作品就很少。看来，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是一个经验，值得很好的总结一下”。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那样，这部影片在当时对鼓舞广大爱国同胞的抗战士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之后，他再度与蔡楚生合作，为启明影业公司拍摄了另一部抗战题材的粤语影片《游击进行曲》，仍由他和楚生编剧，他同时兼任导演。这部描写敌后游击战的影片，也是取材于当时的报纸，凭着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创作出来的，尽管在艺术上还不成熟，但影片所阐明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司徒慧敏回顾这段经历时说：“这在当时只是受抗日救亡的热潮激荡而写出来的东西，只凭报纸和文字材料，没有生活体验就去创作，尽管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方法是不足为训的”。

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更进一步激发着司徒慧敏的创作热情。1939年，他又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国语片《白云故乡》。影片描写广州沦陷后，几个青年赴香港从事抗敌救国活动。其中，意志薄弱者受敌特迷惑而失足，觉悟后痛悔前非，回国加入敢死队，最后，在与敌斗争中以身殉国。这部影片，他根据夏衍剧作提供的基础，比较深刻有力地揭露了汉奸特务金露丝的丑恶面貌，歌颂了香港同胞热烈支援抗日战争的爱国运动，并对主人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怀冰的动摇性进行了批判。孙师毅作词的主题歌，唱出了香港同胞对于祖国的怀念和支援祖国斗争的

热情，增添了感染力量和抒情色彩。这首歌，为广大香港青年学生所热爱和传唱，影响深远。《白云故乡》是一部在导演艺术上处理得比较细腻影片。该片在香港大地影业公司开拍，1940年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完成，八月正式上映。

抗日战争在深入发展，由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抗日热情高涨。司徒慧敏等爱国的电影工作者，为了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行动，他们决定拍摄一部新闻纪录片。那时，司徒慧敏知道自己的故乡开平以至整个四邑，在中共广东中区特委（当时设在开平）的领导下，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军民抗战情绪高涨，涌现许多动人的事迹。于是，他决定拍摄的内容就是四邑军民抗日救国的行动。片名就叫做《保卫大四邑》。那时，司徒慧敏受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聘请，来拍摄这部纪录片。他用香港大地公司的名义进行，由这个公司出钱和供给器材的。他和助手胡振华（开平人）、摄影师白英才三人，于1939年春到了开平赤坎，见到了开平抗日救亡运动主要领导人谢创、关山、司徒毅生、司徒克夫、邓觉民等同志，这些同志非常热情地介绍了开平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切情况。经过初步了解，开始拍摄。先后深入到赤坎、护龙、潭溪、儒艮、蚬岗、赤水和水口等处进行实地拍摄。后来又到了台城、三埠、江会前线进行采访拍摄。拍摄的镜头主要是反映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如宣传队在街头或村庄演说、演剧、游行、集会、出墙报，上门到户进行宣讲、募捐、群众团体到前线去慰劳抗日战士活动、以及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乡间开展的活动等等。当时，开平“妇抗”组织了以周老太太（方玉莲）出面募捐、劳军的活动十分出色，

她成为妇女界的模范，司徒慧敏等作了充分的纪录拍摄。在拍摄过程中是有斗争的。司徒慧敏是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救亡情绪，以求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斗志。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企图反映他们的片面抗战，突出国民党员的行动，往自己脸上贴金，标榜自己是“抗日领导者”，当司徒慧敏他们在开平拍摄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委员伍智梅也跑来了。伍智梅一面压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又想抢镜头标榜自己是“抗日功臣”。司徒慧敏看透了伍的两面咀脸，根本不去理睬她。她要拍她的活动，司徒慧敏等就去拍群众的活动。当时在开平赤坎，由共产党掌握举行了一次悼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伍智梅到大会上想抢镜头，司徒慧敏等却把镜头对准群众，故意避开她。她气愤了，把情况向国民党粤中专员古鼎华说了，要古出面给拍摄组出难题，企图阻止拍摄组到新会去拍摄。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抗日将士都是支持司徒慧敏他们的，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不能得逞。经过约三个月的努力，终于拍摄了五、六本影片，放影时间达一个小时。对于这些纪录片，国民党军委政治部新中国制片厂不予承认。司徒慧敏还是用“香港大地公司”的名义制片、发行。后来，国际著名导演尤理斯·伊文思及美国著名导演佛兰·卡普拉合作的纪录片《中国的抗战》，采用了司徒慧敏等拍摄的影片部分素材，作为其中一段重要内容。当时《保卫大四邑》在美国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华侨聚居的地方放映，还配制成广州语和开平台山语两种语版，很受欢迎，对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影片中使用开平话解说，这是第一次。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实行违背民族利益的反共、反人民、反进步的政策，当时司徒慧敏根据党的指示，再次到香港，与左翼戏剧家夏衍、于伶、章泯、宋之的、金山、舒强、凤

子、蓝马等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由他主持演出了暴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雾重庆》及歌颂反法西斯斗争的《马门教授》（即《希特勒杰作》）等进步戏剧。与此同时，他还就香港电影的现状和问题，在夏衍主编的《华商报》上撰写文章。当1941年4月底，日本统治者派市川彩去香港，妄图拉拢电影界人士，在进行收买活动的时候，司徒慧敏立即在《华商报》上撰文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一阴谋，指出这种“摆出筵席”的手法，“是专门利用被他吞噬到失了灵魂的人，把自己的骨肉送上给他吞噬的”。^①团结了香港的电影界、文艺界人士，反对日本电影的南进政策。

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协助组织旅港的电影界、戏剧界人士陆续撤回内地。1943年由桂林辗转到重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纪录片部主任，拍摄新闻纪录片；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戏剧活动，担任党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的领导工作，任附属剧团团长（中国艺术剧社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民间组织、总干事是金山。这个社的附属剧团，由司徒慧敏、于伶任正、副团长），组织演出过《雾重庆》、《家》、《戏剧春秋》、《北京人》等进步戏剧节目。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重庆，他为了保卫党的安全，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极其复杂的隐蔽斗争，为党搜集了重要情报并从事传递情报的工作。

到美国学习

抗战胜利后，司徒慧敏脱离中国电影制片厂，1946年初参加筹组昆仑电影公司，1946年7月带着党的嘱托，远渡重洋到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同时从事华侨工作。起先在好莱坞企

业电影场及西电公司影场学习和工作，后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课目，并入雷电华公司纽约厂工作。在美国，他广泛结交了电影界进步人士，结交了世界著名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和美国著名导演、演员和技术专家。并通过《华侨日报》与“世界戏院”联络了南北美洲各地的爱国华侨，还为留美华侨海员的学习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47年他在美国导演和拍摄了舞蹈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由当时旅美的我国舞蹈家戴爱莲主演。这部影片曾获1948年英国爱丁堡纪录影片电影节优秀奖，同年末被纽约布洛林（Brooklyn）音乐舞蹈学院评选为五部最佳舞蹈片之一。1951年底，他奉命回国参加建设。由于受到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迫害和干扰，绕道欧洲，转辗至1952年4月才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

电影和侨务工作的好领导

建国初期祖国建设的蓬勃朝气激励着司徒慧敏，他决心要为中国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重返祖国影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工作。在这里，从购买土地到调集创作、生产、后勤人员，他参加讨论和规划。同时，他还兼顾文化部电影局的技术工作。他在八一厂领导建厂工作期间还编导摄制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通过这部影片的拍摄，为八一厂培养了一些专业创作干部和技术人员。

1953年，司徒慧敏负责电影局专家办公室和技术处的工作，和汪洋、钟敬之等负责组织制订了中国电影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他担任了电影局技术处处长、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第

一任所长，1956年，他担任电影局副局长，负责领导电影技术工作和外事工作。他为新中国的电影技术、电影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一个拓荒者的作用。是我国电影科研工作的开拓者。他是我国电影制片、电影机械和电影胶片工业及电影科研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他不辞辛苦奔波于西安、成都、广州、新疆等地，为制片厂选择厂址，亲自规划和参与了电影洗印厂和南京、上海、哈尔滨等几家电影机械厂的建设工作，还亲自参加最初筹建电影胶片工业，从组织培训人员直到选择厂址等工作。在筹备拍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的工作中，他甘当“后勤部长”，亲自深入到各电影制片厂和创作人员、技术人员谈心交朋友，审看样片，为了提高影片的质量，帮助解决摄制工作方面的许多实际问题。1965年，他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领导工作，他在该片的导演团里一方面和导演、摄影以及其他主要创作人员共同研究拍摄计划，另一方面还要解决拍摄技术问题，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出色的艺术、技术水平。

在十年浩劫中，司徒慧敏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但他以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坦白，经受了各种逆境的考验，特别是对“四人帮”攻击周总理，迫害电影戏剧人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75年他回到电影工作岗位，担任电影局负责人。

1978年7月至1982年，司徒慧敏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外事工作及科学技术工作）。他还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广播电影电视部艺术学会理事长。工作十分繁忙、辛苦，但他老当益壮，勤奋不已，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电影电视事业，使电影电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繁忙工作中，为制定振兴我国电影技术的奋斗目标，建立现

代化电影技术体系发挥了更高的热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作为华侨，司徒慧敏也是我国侨务界的知名人士，早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就从事华侨工作，建国后也一向关心侨务工作。近几年来，还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和全国侨联的领导工作，任人大侨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侨联顾问。还曾当选为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华侨摄影学会会长，文化部归国华侨联谊会名誉主席。他多方兼顾，广泛密切联系国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促进华侨爱国团结和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殚精竭虑，深受广大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崇敬。他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颇费心力，经常会见海外来访的文艺界朋友，以老朋友身份，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欢迎他们随时回大陆参观，鼓励他们为祖国统一作贡献。他也是中国新闻社理事会理事，为中国新闻事业作出贡献。

1987年4月4日，司徒慧敏因患癌症医治无效，6时10分不幸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终年七十七岁。司徒慧敏遗体告别仪式于4月1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方毅、胡乔木、胡启立、邓力群、耿飚、黄镇、彭冲、汪锋等以及侨界知名人士廖晖、张国基、何英、洪丝丝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陈云、彭真、邓颖超、杨尚昆、陈丕显、王震、周谷城、康克清、叶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侨委会等送了花圈。

司徒慧敏的学识渊博，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六十多年来，他的艺术实践、技术实践和革命实践，都丰富了我国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宝库，他那勇于创新的精神，将激励后来者，为创造影坛群星灿烂的年代而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他关心他人，关心华侨、归侨、侨眷，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将自己全部精力，无私地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